

目 录

1 研究设计与知识积累	1
范式的兴衰:一个例子	8
理论与范式脆弱性的原因	21
这一领域不确定的未来	26
本书计划	28
 2 你选择的问题如何影响你的答案:	
大问题,小答案	33
“以学术为志业”,而不只是一份工作:选择一个研究主题	34
浪漫的问题,可靠的答案	45
把大问题分解为多重过程的例子	48
小结	102
 3 你选择的案例如何影响你的答案:	
选择偏差及其相关问题	104
问题的本质	106
根据因变量选择案例:一个简明的例子	109
复杂历史论点中根据因变量所做的选择	124
时间序列、案例研究与选择偏差	136
案例研究、时间序列与趋均数回归	144
小结	151

4	你使用的证据如何影响你的答案: 严格使用案例研究中包含的证据	153
	案例研究证据的角色及其恰当使用	156
	非定量的操作化与衡量	167
	来自利普赛特与罗坎的一个例子	174
	小结	204
5	你选择的路径如何影响你的答案: 理性选择及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	207
	理性选择区别于其他方法的特征	209
	理性选择的应用	227
	理性选择与比较政治学的前沿	242
6	结 论	249
	参考文献	262
	译者后记	263

研究设计与知识积累

1

“我是奥西曼德斯，众王之王。
强悍者呵，谁能和我的业绩相比！”
这就是一切了，再也没有其他。
在这巨大的荒墟四周，无边无际，
只见一片荒凉而寂寥的平沙。

——帕西·比希·雪莱，“奥西曼德斯”^①

刚刚过去的这三十年，对于发展中国家政治的研究者来说很不友好，这几乎就跟岁月对奥西曼德斯的消磨一样^②。正当走向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冲动已经“得到了各种日益趋同的分析路径（approaches）的充分解释，并因而以其庄严的必然性甚或永恒性得到了充分理解之时”（Hirschman 1979，98），民主化开始席卷世界上许多

① 查良铮译：《雪莱抒情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重印第1版，第37页。——译者注

② 《奥西曼德斯》（*Ozymandias*）是雪莱的一首诗，他用石碑上法老的话和现今的废墟来比照：一方面是石碑上法老傲慢与自大的话语，另一方面是几乎快要被岁月消磨殆尽的废墟，雪莱用这个强烈的对比来讽刺法老的愚蠢。格迪斯在此处借用这个典故来讽刺理论家们雄心勃勃地建立起来的理论，最后都像是奥西曼德斯的功业一样随着时间流逝化为尘土。——译者注

地方。在另一轮更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中,每一个区域的政府都开始放弃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转而支持更偏向市场导向的政策。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帝国崩溃了。虽然学者们已然以一种愉悦的态度来对待大多数这些事件,但是,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这些事件会发生,因为在这些变化开始之时占据支配地位的理论,并没有对这些事件做出预测(参见 Remmer 1995, 103; Kalyvas 1999)^①。

面对世界上诸多令人瞩目的事件,学者们很快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试图理解这些事件。作为这些调查的一个最初成果,他们认识到,在那些比较发展的研究者所珍视的理论中,几乎没有哪一种理论为解释最近的事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针对“从威权主义的转型”的研究中,旧理论有限的有效性早就被注意到了(有时是那些先前的研究者自己注意到的)。不管是在对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期间威权主义迅猛发展的解释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受依附论影响的观点(dependency-influenced arguments)(例如, O'Donnell 1973; Cardoso 1973a),还是对民主化的历史性解释(例如, Moore 1966),似乎都没有为解释民主制与威权主义之间的突然转变提供太多的帮助^②。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和菲利普·施米特(Philippe Schmitter)就强有力地指出了标准的利益集团分析路径或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路径的

① 很多学者已经分析过最终在这样那样的威权主义中导致转型的脆弱性和矛盾。例如,参见 O'Donnell(1978, 1979)对在“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政权内部联盟伙伴之间的、具有潜在削弱性的紧张状态的分析。然而,在我看来,没有人预料(expect)或是预测(predict)到我们所目睹的席卷大部分发展中世界的民主化与经济改革。

② 鲁斯切梅耶、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不同意这种在其他情况下已被广泛接受的结论。他们试图通过对由摩尔(Moore)开创的传统做出一系列实质性修正,以及纳入额外的变量和偶发事件(contingencies),来使这一传统苟延残喘。

不足。

在这些转型期间……要**事先**(*ex ante*)确切说明哪些阶级、部门、机构以及其他团体将会扮演什么角色,选择哪些议题,或是支持什么替代选择,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些]选择和过程而言,那些有关社会、经济和制度参数的相对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假定显然不妥,因而有关这些参数的描述力和解释力的假定也是不妥当的。(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4-5)

克里斯托弗·克拉彭(Christopher Clapham)和乔治·菲利普(George Philip)也强调政权转型明显的不确定性:“军政权(military regime)更迭的模式相当像穿过丛林的小径:有许多不同的足迹,而且所有的小径都非常难走……,而且无论如何,大部分小径都不会通向你想去的地方”(Clapham and Philip 1985, 24)。当我们缺乏理论来解释过程的时候,过程就会显得既复杂又难以预测。

论述市场化的文献也面临类似的困难。经验研究发现,用以解释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因——利益集团的影响——几乎不能解释与经济自由化相关的政策变化(例如,参见 Haggard 1990; Haggard and Kaufman 1992, 1995; Bates and Krueger 1993)。然而还没有人已经发现或是构想出一种比利益集团理论更好的理论路径。结果就是,对经济自由化的分析,就像是那些对民主化的分析一样,多年以来还主要是在描述^①。

相比之下,苏联帝国的研究者发现解释其崩溃更为容易。他们的

① 对经济学家而言,他们的迷惑就在于为什么自由化耗费的时间如此之长,他们已经提出了很多对利益集团理论的微调来解释被延迟的改革。例如,参见 Alesina and Drazen (1991)、Fernández and Rodrik (1991)和 Rodrik (1994)。然而,在提出新的理论或是对旧理论进行系统性修正时,政治学家面临的困难更多,对他们而言,经济改革的政治障碍似乎显而易见,而改革的启动似乎更令人迷惑。

问题不是对崩溃的预测太少,而是太多。至少自 1950 年代以来,很多对苏联等政权的分析就强调了其内在的功能失调和矛盾。当这些政权最终垮台的时候,这些功能失调就被援引为原因。然而,这些政治体系却已经在东欧持续了四十年,在苏联持续了七十年^①。转型文献的一个怪异之处就在于,对于长期存在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大部分早期的分析都强调它们的矛盾与脆弱,却几乎没有多少对军政权崩溃的讨论——它们持续的时间平均仅约九年——聚焦于政权脆弱性的内在根源^①。

那些长期贯穿于发展中国家研究的文化理论、社会结构理论与经济理论,似乎对解释当代的事件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既然如此,学者们便转向对政治的研究来寻求答案。但是,我们的理论橱柜几乎是空的。由于我们过去未能成功地对发展中国家政治过程的内在运行方式进行理论化,一旦需要建立用政治原因来解释政治结果的理论时,大部分的分析者就会发现他们处在一个全然未知的领域之中。其结果就是,我们会在早期论述民主化的文献中,发现对偶然事件和唯意志论(voluntarism)的强调(例如,O'Donnell, Schmitter, and Whitehead 1986; Diamond, Linz, and Lipsett 1989)。

有一些学者试图解释不同国家对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国际经济危机的反应,与那些研究民主化的学者相比,他们发现传统理论有更多的用武之处,但是,对经济自由化的早期分析仍面临着缺乏理论指导的问题。如同来自国内经济利益的压力一样,国际因素(主要是来自于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继续受到关注。然而,国家的危机状况与

① 格迪斯此处的批评焦点在于,不能用一个不变的东西去解释变化的东西,即苏联和东欧政权的脆弱性这样一个几十年都没有发生变化的因素,不能被用来解释这些政权垮台这样一个变化的现象。——译者注

① O'Donnell (1978, 1979)是最为有名的例外。

决策者个人的特殊信仰和归属也在分析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参见 Stallings and Kaufman 1989; Haggard and Kaufman 1992, 1995; Bates and Krueger 1993; Haggard and Webb 1994)。尽管有一些建立理论的努力(例如, Frieden 1989), 但弗里登(Frieden)的这篇文献, 就像是论述民主化的那篇文献一样, 主要还是在描述, 而且其关注的焦点仍是不同案例中决策的细节。简而言之, 研究民主化与经济改革——在 20 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期中这是发展中世界里最引人注目的两个话题——的学者, 发现了旧有理论的不足。

这个问题并不是由在我们控制之外的自然行为或是人类行为所引起的。本书的出发点就是, 当我们忽略了研究设计的基本问题时, 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自己的命运。为了取得成功, 社会科学必须在斯库拉巨岩与卡律布狄斯漩涡之间的航道上小心翼翼地前行, 巨岩这边是可爱的但却未经检验的理论, 漩涡那边则是未经理论组织的信息^①。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的大部分研究都没能坚持这一困难的路线, 而是相反, 从一个灾难性的极端猛地跳到另一个极端^①。其结果就是在该领域的很多分支之中, 理论知识积累缓慢。观点、理论甚至范式倾向于在快速的更迭中兴旺衰败, 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表明它们曾经存在过。就像精心搭建沙堡一样, 人们已经以巨大的努力和对理论细节的关注而建立起了范式, 但这些范式最后却只是被下一代研究生的浪潮冲走, 他们的研究不断地冲击现存范式的弱点——他们理应如此

① 斯库拉(Scylla)与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两个妖怪。斯库拉是吞吃水手的女海妖, 守护着墨西拿海峡; 卡律布狄斯是漩涡怪, 每日吞吐海水形成漩涡, 将过往船只吞没。而现实中的斯库拉是位于墨西拿海峡一侧一块危险的巨岩, 它的对面即是卡律布狄斯大漩涡。——译者注

① 针对这一批评, 有很多明显的例外情况, 这当中包括大部分对西欧民主政体的研究。尽管如此, 这一批评仍适用于该领域的大部分内容, 尤其是研究“大”问题的那一部分: 如民主化、发展、经济政策改革和革命。

做——直到这些理论大厦崩溃消失。

每一个当前的新事件都需要从头开始研究,这不能归因于比较政治学家理论想象的失败。相反,这不是因为我们周期性地抛弃这些旧理论,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利用、发展并扩展这些理论。这并不是说我们滥用理论,或者说对我们的理论不忠。就像其他的学者对待他们自己的理论一样,我们以同样的热情和韧性坚持我们的理论。问题在于,我们的理论——那些未经与事实进行系统性验证而谱出的“塞壬之歌”^①——最终使我们的梦想破灭。残酷且令人不适的事实,常常在创立理论的时候是可得,但我们却没有使用这些事实,而这些事实终将引起我们的注意,并迫使我们放弃自己的理论。

结果,在面对世界上新发生的事件时,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理论工具来解释它们,注定要从零开始,用非结构化、归纳的方式来探寻潜在的模式。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归纳性的探索,能够引起概括 (generalization) 与 相关 (correlation), 这又进而导致理论推断 (speculation) 产生。然而,更为典型的情况往往是,归纳性的事实收集任务产生了大量未经组织的信息。“只有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没有受先前已建立理论的指导而搜集到的事实,才足以明确地宣告允许第一个范式的出现。”^② (Kuhn 1970, 16)。在实践中尽管不一定如此,但由归纳性研究所产生的理论推断还是容易遭到含糊而未加阐明的基本原理与没有被彻底想通的行为假定 (behavioral assumption) 的损害。在研究所考察的那个案例集合中,因果之间显而易见的关系可能会被发现,但是,人们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努力去查明这种关系是否也

① 原文为 siren songs,直译为“塞壬之歌”。塞壬 (siren) 三姐妹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她们用自己的歌喉使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航船触礁沉没。——译者注

②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页。文字略有改动。——译者注

在其他案例中间出现。有时历史细节取代了因果论证 (causal argument), 对导致结果发生的事件的概述取代了解释 (explanation)。作者们可能会告诫读者其探索性的观点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以此来小心谨慎地捍卫所提出的观点, 但是, 大部分读者无视这些告诫, 并且把这些观点当作确定性的发现。结果, 稳健的、长命的理论通常都不能从归纳性的工作中产生。

本书的主旨就在于, 如果特定的研究规范得以改变, 那么, 在未经检验的理论与非理论性 (atheoretical) 的数据之间的狭窄航道上, 我们就能航行得更为顺利, 因而理论知识的积累也会更加迅速。尽管研究规范正在改变, 但在很多研究之中, 研究设计的基本原则却继续被忽略。常见的问题包括对案例的不恰当选择 (从这些案例中可以得到用以检验理论的证据), 以及对非定量测量的不认真态度, 这两者都削弱了证据的可信度 (证据是被收集来用以支持论证的)。我们没能成功地组织和存储证据, 以使这些证据对于其他人也是可得的, 这提高了重复的成本, 而且也减缓了理论进步的速度。这些理论没有经受过系统性的经验检验, 而读者又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理论, 这使问题更加恶化。

的确, 由于严重的信息限制, 就发展可靠的理论而言, 我们工作的环境十分恶劣, 但是, 恶劣的环境有时也会带来有用的创新。本书的研究将会提出一些创新以及从其他领域借来的一些思想。本书将探讨上文所提到的一些普遍存在的方法论习惯做法 (practices), 揭示它们所导致的令人遗憾的结果, 并且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我们从一个有争议的主题开始: 将对“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 (Tilly 1984) 的迷恋, 转化为有用的与可重复的研究。随后我们探讨诸如案例选择与概念操作化这样相对好理解的问题。最后, 在结尾部分, 本书讨论一个好的理论应该具有的特征, 并且强调理性选择框架 (rational choice

framework)作为一种可能的理论创建路径的用途和局限。

范式的兴衰:一个例子

尽管我们已经对发展中国家做了大量出色的研究,但是,在对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所做的研究之中,上文所提到的方法论缺陷仍然十分常见。为了阐明脆弱的研究规范会怎样引发沙堡效应,我将简述一种在比较发展领域内十分引人注目的理论传统的历史。我在此重提的这段知识史与现代化范式和依附范式的兴衰有关,大多数比较政治学家对此都会感到很熟悉。我们当中有不少人都曾为了准备资格考试而复习过这一内容。这些范式的基本论点和概念,也许只有那些年轻人才会觉得新鲜。我会使用一场关于这一例子的重要且广为人知的争论来说明我将在后文中所处理问题的重要性,尽管这个例子现在已经过时了。

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研究史可以根据范式的兴衰来划分时期,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政权的兴衰来划分自身历史时期的做法如出一辙。我对**范式**(paradigms)这个词的用法与托马斯·库恩的用法(Kuhn 1970)稍微有些差别,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把范式定义为在特定时期对一类特定现象的支配性理解。马太·杜甘(Dogan 2001)指出,以库恩的定义来看,政治科学处于前科学的阶段。因此,库恩式的主导型范式在该领域从来都没存在过。然而,由理论、假设、应用以及研究者偏爱的方法论所构成的集合——我称之为**范式**——的确拥有库恩赋予范式的其他大部分特征。它们包含一系列已经被追随者

们广泛接受的事实性与解释性知识主张(knowledge claims),换句话说也就是理论。而且它们引导与限定了进一步的研究;确定哪些事实在理论上是最重要的;界定什么是悖论以及哪些问题迫切需要解答;确认哪些案例需要得到考查以及何种证据被认为是有意义的。

就像政权一样,范式有时候会被组织良好、富有凝聚力且被动员起来了的反对派推翻——例如,现代化“理论”被依附“理论”推翻。别的时候,范式之所以衰落是因为其内在矛盾和它们在处理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对理论不利的事实时时无能——这就是依附理论在1980年代早期的命运。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像政权一样,尾随范式的衰落而来的是充满混乱和争议的时期。这样的阶段曾随着依附理论的衰落而出现。

为了取得成功,范式需要具备与成功的意识形态相同的特征。意识形态简化了世界,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来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并且确认需要做什么。范式的基本观点应当是简单的,但它们应当能被用来解决一大批令人困惑的问题。它们应当具有“啊哈!”的因素——也就是说,它们应当让那些刚接触到它们的人大喊:“那一定是对的!为什么我就没想到呢?”最后,范式应当是富于成果的:它们所包含的理论需要解释从前未被解释的规律,并且创造出新的悖论和难题。就像意识形态必然包含必需的政治行动或政策一样,一个成功的范式必然包含一个充满困惑和悖论的研究前沿,学者们需要对这一前沿进行钻研。在那些由理论所导致的值得注意的悖论当中,集体行动理论制造出了大量对投票率的研究,西方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制造出了大量对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研究,这两类研究在其各自的知识性框架内所扮演的角色是相同的。在这两个例子中,原本在人们看来是现实世界里稀松平常的现象——那就是公民投票和工人革命失败——都被置于严格的观察和讨论之下,这是因为在这两种理论各自

的理论世界观之内,基本的理论前提使得研究者对那些平常的现象产生了困惑。

以下的简史会说明证据与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之间的关系。范式内的理论会提出一些预期,但这些预期不一定与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一致,当有证据显示这种不一致已经大到了令人无法忽视的程度时,这一范式也就丧失了其将研究结构化的力量。这就是科学进步的一般模式:早先的理论理解先是被与之不符的事实所削弱,随后又被能同时包容新旧证据的新理论所取代。因此,这里强调的重点不是说在比较发展这个子领域中,理论或范式是以某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被推翻的,而是说研究者在创建理论时就可以得到那些本来会质疑其理论的证据。他们本用不着花几十年的时间才注意到存在过多对理论不利的事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发展中国家开始得到政治科学家的集中关注时,这一新兴领域的中心问题便是(并且现在依然是):什么导致了民主?什么阻碍了经济发展?学者们不仅仔细考察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经历的事件和进程,而且还回过头来研究了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历史发展,并比较了通向发展的不同政治、经济道路。新出现的范式是一些假定、概括与假设的松散集合,人们慷慨地称之为现代化“理论”。我之所以给现代化理论贴上范式的标签,是因为构成这一理论流派的概括、假设和理论形成了一个多少算是内在一致且逻辑连贯的整体。

现代化范式反映的是它建立时所处的时代,所有的范式都是如此。它的一些中心观点依据的是研究者在1950年代左右对世界所做的观察,那时技术和民主似乎正从北大西洋国家向世界各地迅速传播。观察者们假定,他们可以根据他们所处的时代来推断未来的情况。该范式的另外一些观点源自当时的学术理论,尤其是对政治的多

元主义理解和新古典经济学。

政治生活的多元主义图景促使研究者做出这样的预期,即通过各社会利益集团间的互相影响,转变会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发生(参看 Binder 1986)。新古典经济学则为以下这种观点提供了理论支持:国际经济只是一种媒介,通过这一媒介我们可以进行贸易,从而使资源得到最为有效的利用,并且使所有参与者都可以获得基于比较优势的专门化所带来的收益。

近半个世纪之后,如果我们对现代化理论做一个事后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理论中那些得到了仔细检验的部分(按照 1950 年代的标准)很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尽管它们曾经在历史的垃圾箱里待了一阵子,但后来人们还是把它们分拣了出来,除去灰尘并放回到了书架上。这些观点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民主与经济发展间的相关关系(Lipset 1959; Jackman 1973),当时的研究者认为,这种相关支持了那种认为发展会导致民主的观点^①。许多从经济学中推导出来的论点也幸存了下来。然而,现代化理论最基本的观点中有相当一部分从未得到检验。其中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起源于西欧的价值观的传播,会促使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迅速向现代社会与现代文化转型(Levy 1966)。对价值观传播效果的预测既是基于西北欧的历史经验,也是基于以下这样一种事实,即发展中社会在战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接受了某些物质创新,如疫苗和现代运输方式。尽管对那些沉浸于韦伯式观念的人来说,价值传播论是可信的,但是这一观点从未得到过检验。也就是说,没有人曾尝试去测量价值观的传播,并展示价值

^① 在比较政治学中,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是一种得到了最彻底的检验的观点。然而,对这一关系的阐释依然处于争论之中(参见 Przeworski and Limongi 1997; Przeworski et al. 2000)。

观的转变影响到了发展^①。

有关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的观点也尚未得到检验。观察者们认为,技术的快速扩散会促使经济迅速发展,而且,文化与社会的现代化也会随之自动实现,这是因为工业化所需的资源流动性改变了地位、预期与角色(Moore 1963)。他们强调技术创新便是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它会给社会、政治和文化带来意义深远的改变,这种想法与马克思对欧洲现代化的阐释是一致的。在技术的实际扩散过程中,一些创新的扩散速度远远快于另外一些创新,比如说疫苗的扩散速度比生育控制的扩散速度快,但是,技术创新扩散的后果却没有被测量,而且那种认为技术扩散会导致文化与社会变化的预期也没有得到检验。

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们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很少关注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这些利益集团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形成的,他们也很少关注是否有可能通过暴力、叛乱和革命的方式来推翻传统秩序下形成的特权集团。他们期待相对和平的渐进式转变,这些期待反映出了英国和北美在十九世纪后期的经验,并且这种期待也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多元主义政治图景相一致。他们既没能考虑到在世界其他地区,有许多发展停滞或发展迟缓的例子;也没能考虑到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以及早期的英国与美国)的历史中,暴力更严重且冲突更激烈。与扩散假设(*diffusion hypothesis*)一样,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使得人们认为这些预期是可信的,但是,无论是其基本论点,还是隐含于论点中的因果机制都没有得到检验。研究者所考察的案例不仅数量少,而且还都是从最发达的国家中选取出来的。我将在下文谈到,在我们希望去解释的结果连续统(*outcome continuum*)上,如

① 一些开创性的研究的确表明,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的公民在价值观上存在差异(例如,McClelland 1961)。

果只从一端选取供研究的案例,我们得出错误结论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我们没能将现代化理论的许多基本思想置于严谨的经验检验之下,这就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理论中与现实不符的那些观点没有被剔除出去,五十年以后,理论中包含这些观点的部分会继续限定我们对于发展的思考。第二,有些反常现象本来会使我们放弃一些理论观点并对其他观点做出细微修正,但是学者们却把这些反常现象视作对整个范式的挑战。由于在匆忙得出上述这一结论之前,学者们无需克服由那些支持范式的经验发现所构成的巨大障碍,所以该领域中的大多数学者会因为其发现的一些反常现象而抛弃掉整个范式。在学术上摒弃该范式也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抛弃由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支持的政策提供了依据。

对现代化理论的挑战源于两类学者所做的观察——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发达国家学者。现代化理论试图去解释的那种“现代化”似乎并没有发生。新的一批繁荣且民主的社会并没有出现,相反,观察者们看到的只是停滞与畸形的社会,他们认为,这种社会是先进与落后国家之间那种冷漠与剥削性关系的产物。

创新从先进国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是不均衡的,其产生的大量结果是现代化理论家们没有预料到的。被外国投资者植入飞地^①的现代工业技术没能传播到经济体的其他部分。面向国内市场的农

① 飞地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通俗地讲,如果某一行政主体拥有一块飞地,那么它无法取道自己的行政区域到达该地,只能“飞”过其他行政主体的属地,才能到达自己的飞地。一般把本国境内包含的外国领土称为内飞地(enclave),外国境内的本国领土称为外飞地(exclave)。——译者注

业生产也落后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步伐,这使得粮食供应变得紧张,国家也越发依赖于进口粮食。工业从非生产性农业部门中吸收的劳动力太少,因此根本无法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农村贫困人口与社会其他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断增大。经济增长没能带来充足的、可自给的国内投资,结果,发展中国家仍旧依赖国外的资本与技术。对进口的持续依赖使得国际收支危机不断发生,而且危机的状况也愈演愈烈。如果医疗技术创新的扩散没有伴随农业产量补偿性的增长,人们就会陷入对贫困加剧的恐惧中,因为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现代化理论家们正在制造和散播其理论观点,但是,这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并没有被囊括到修正后的理论中,这是因为在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当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致力于仔细检验自己的理论观点。

在政治领域,军事干预和一党统治的巩固先于稳定民主政体的创立。在那些传统公私互动模式^❶盛行的社会,引入北方国家的政治形式只会使得政治体系被裙带关系、腐败以及庇护主义(clientelism)侵蚀,尽管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中软弱的民主政体还在勉力维持。在许多国家,公共资源与私人资源之间的界限似乎极为模糊。

在这些特定的国家做实地研究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些变化并将它们记录在案例研究之中,这些案例研究至今仍是了解当时当地最为有效的资源。然而,由于当时的研究规范并不强调跨案例检验理论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洞见对那些制造宏大理论的研究者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这些折磨着发展中国家的难题使得现代化理论所做出的乐观预期受到了质疑。北美学术圈里的研究者最终逐渐意识到,与现代化范

❶ 传统公私互动模式的特点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模糊。——译者注

式相关的许多预测都没有实现,这就使得现代化范式很容易被一种新的路径推翻,就像法国大革命前的旧秩序(*ancien régime*)被推翻一样。这种新路径逻辑连贯,令人信服,符合其时代潮流,但也未经检验——它就是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截然相反。这种理论认为,融入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带来的后果与国外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的剥削导致了在发展中产生的难题。依附理论秉持者们假设,经济困难有两个宽泛的原因:依附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所带来的客观压力;跨国公司及其在依附国国内的政治同盟者损害依附国国家利益的逐利行为(例如,参见 Sunkel 1972, 1973; dos Santos 1970; Frank 1967, 1970; Cardoso 1973b; Brown 1963)。

落后国家在国际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有许多特点,其中,那些被**依附论者**(*dependencistas*)假定对发展有害的特点包括:原材料的贸易条件^①对其不利(Prébisich 1950; Cardoso and Faletto 1979, 155);面对其少数几种出口产品的国际价格变动,它们也极为脆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贸易伙伴与援助、投资和贷款的提供者。

依附理论假定,跨国公司的利益与东道国的发展需求之间存在冲突。通常,**依附论者**将跨国公司与其在东道国内的同盟者——一些组织与个体行动者——描绘成国际经济力量影响国内经济结果的媒介。在依附范式中,缓慢增长、经济瓶颈、持续依附以及国际收支危机都被归因于跨国活动所引起的资源流失,这些跨国活动包括利润汇回、转让价格、进口优先于国内投入和保持对新技术及创新发展的垄断,等

① *terms of trade*,是指一国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值。如果在一定时期内出口一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基期增加(减少),则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改善(恶化)。下文为通顺起见,有的地方会翻译为“进出口交换比价”。——译者注

等(Baran 1957; Evans 1979, 19-38; Leys 1974, 8-18)。

依附理论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做出结构主义的批判来建立起自己的经济理论和阐释。结构主义批判的核心就在于,在发达与不发达经济体之间进行的贸易中,收益分配对不发达的一方不利(Prébisich 1950; Singer 1950)。依附论者使用的基本分析模式依据的是马克思的观点。依附理论把阶级看作最重要的社会行动者,把阶级斗争看作政治变革发生的途径。这种理论对国际经济的看法源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论述帝国主义的专著(例如 Lenin [1916] 1968)。

支持这些论点的证据大部分都是轶事证据^①。当这些论点得到的是定量证据的支持时,研究者们所推断出的东西比数据实际上所能支持的东西多得多。例如,著名的“普雷维什命题”(Prébisich thesis)就在经验上得到了一个时间序列的支持,这一时间序列展示了数十年当中阿根廷进出口交换比价的变化,在那段时间里,阿根廷的主要出口产品小麦的国际价格一直在下跌。研究者从一个在某段时期出口少量农产品的国家的经验出发,得出结论认为,作为一个大类的初级产品,其进出口交换比价一直在下跌,而且出口这种产品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但分析家们没能注意到驳斥这种观点的经验研究^①。

早期持停滞观点的依附理论最终被一些反常现象所削弱,但这些

① anecdotal evidence,意思是指那些仅仅根据独特的个人经验,而非根据可靠的研究或统计而得出的证据。这种证据通常以故事的形式存在,并不可靠,也不能用来检验论点。——译者注

① 其他研究表明,原材料贸易条件根据所研究时期的不同和所研究商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国际经济并不总是对基础产品的生产者不利(Goncalves and Barros 1982; Brown 1974, 242-248; Haberler 1961, 275-297)。早期的研究者曾试图用定量方法来检验被归到依附理论这个标签之下的理论,麦克高文和史密斯(McGowan and Smith 1978)对大多数的尝试做了回顾。

反常现象并非来自学术研究,而是来自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那些事件已经大到了令下一代学者无法忽视的地步。早期依附范式的影响力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达到顶峰,这恰恰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时候——这与依附理论的预期相反。从1960年到1979年,拉丁美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简称GNP)年增长率平均为3.3%,而曾经正是该地的经验制造出了依附观点。这一增长率与工业化国家(日本除外)同期平均2.9%的人均增长率相比并不逊色^①。此外,由于拉美的人口增长率有工业化国家的两到三倍之高,因此两者绝对GNP增长率之差要比人均GNP增长率之差大得多。

换言之,早期依附理论曾试图解释的经济停滞和缓慢增长,已经毫无疑问地从拉丁美洲消失了,即使这些现象曾经存在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增长率近乎应验了依附理论/新殖民主义理论的预期。1960年到1979年间,该地区(南非除外)的人均GNP年增长率平均只有1.6%——参照当时的国际标准水平,这一增长率是很低的。尽管如此,即使是在非洲,人均增长率为正这一事实也驳斥了更为极端的“停滞论”的预测。与此同时,一些贸易依赖型的亚洲国家增长速度惊人。那些提出早期依附理论的学者们没能做到最基本的事实核查,而且,很多比较发展领域中的学者也接受了他们的知识主张,尽管这些知识主张缺乏系统性证据的支持。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得到了增长,其证据是不可否认的,作为回应,相关学者修正了依附理论。尽管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增长速度可观,但它们仍然面临非常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依附论者不情愿放弃这一套在直觉上引人入胜的、在演绎

^① 这些数字是从世界银行的资料(World Bank 1981, 134-135)中推算得出的。

上令人信服的理论。研究者修正了受依附论影响的观点,并利用它们来解释不稳定且危机四伏的增长,以及导致分配不均、政治不稳定与威权主义的二元经济。

致力于研究依附传统的分析家们认为,诱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危机的“结构性”原因是依附关系所固有的。在结构主义者看来,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两个现象:对出口初级产品的依赖,其目的是为了赚取外汇,再就是发展中国家里存在的二元经济。他们辩称,依赖出口初级产品会把通货膨胀带到国内经济中来,而且,由于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初级产品又面临着大幅且快速的国际价格波动,所以依赖出口初级产品也会引发国际收支问题。

依附论者把二元经济的发展与外国控制依附国生产与贸易的历史联系了起来。二元经济的本质特征包括:规模庞大的传统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再就是收入分配严重扭曲。传统农业部门似乎无视来自市场的激励。其后果就是,粮食生产落后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因此,二元经济体有必要增加粮食进口,但这却使国际收支问题更加严重。传统农业部门的利润本该有助于资本积累,但其利润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扭曲的收入分配刺激了对奢侈品的需求,从而使国际收支问题更为严重,这是因为,即便这些奢侈消费品是在国内制造的,它们仍然使用国外的原材料、国外的技术与国外的资本。依附理论把这些问题持续存在的原因归结于在依附国经济中大量存在的外国公司,尽管依附国实现了高速工业增长(Sunkel 1973; Cardoso 1973a, 146-148)。

这些论点大多数都只是得到了体现(illustrations)而非检验(tests)的支持。少量的跨国统计研究的确确认了这样一种论调,即经济上的依附会导致扭曲的收入分配和其他问题(Chase-Dunn 1975; Bornschier, Chase-Dunn, and Robinson 1978),但是,与早先依附理论的情况一样,

对修正后的依附范式所做出的推论构成挑战的那些跨国研究被忽略了(例如, Kaufman et al. 1975; McGowan and Smith 1978; Jackman 1982)。事实上,一些著名的依附理论家拒绝承认检验是可能的或必要的(Cardoso 1977)^①。

当发展中国家沦为独裁政权的受害者时,依附论者以及其他受其思想影响的研究者将威权主义归咎于特定的环境,这种特定的环境产生于依附国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互动过程。他们提出了一些论点,并用这些论点把威权主义与依附联系起来。这些论点中最为有名的一个通常被称为“官僚—威权主义”模型,这个模型假设,晚期依附型工业化与早期现代化国家的工业化有所不同,差别之处就在于前者包含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政治”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轻松的“进口替代”阶段,这种进口替代的基础就是生产相对简单的消费品,在此期间,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数量较少;第二个阶段是“深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对简单消费品的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进一步进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机遇就在于生产需要更多资本投入的商品。在轻松的工业化阶段,资本需求相对较少,这使得工人能够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并参与到由此所产生的具有包容性的政治系统中。然而,这一阶段结束后,资本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雇主和工人的利益也产生了分歧。于是资本家便支持排他性的威权政权,因为这种政权可以镇压工会并压低工资,以便资本家们更为迅速地积累资本(O'Donnell 1973)。

本国资本家在削减工资上的意愿与外国公司在收入分配集中化上的意愿是一致的,这可以为他们那些面向高收入者的消费品创造更

① 杜瓦尔(Duval 1978)认为,卡多索和其他做出类似声明的学者的意思就是,依附(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状况决定了一连串论点的适用范围,但依附本身不应被视为这些论点中的一个变量。然而,以这种方式思考依附理论,并不意味着有望在适用范围内有效的论点不应该被检验。

大的市场(Cardoso 1973a)。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使得军方有意愿镇压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也有意愿鼓励资本积累以提高增长率。增长是军方更为渴望实现的目标。这是因为,一方面,增长有望削弱共产主义对贫困阶层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增长也有望使军政府赢得更高的地缘政治地位,并获得更为稳固的军事实力基础(Stepan 1971)。

意愿的趋同为本国资产阶级、国际资产阶级与国家的联合提供了基础,这里所说的国家是被军方和技术专家把持的,它支持官僚威权政权及其政策(Evans 1979)。“官僚—威权主义”对此提出了一种解释,以说明为什么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几个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会屈从于威权主义,而根据现代化理论的预测,它们本来更有可能走向民主。与在它之前的许多研究相比,在对“官僚—威权主义”进行详尽阐释时(O'Donnell 1973),奥唐奈不是只从结果连续统的一端来选择用于检验的案例:他比较了那些经历过军事干预的国家与那些没有经历过军事干预的国家。他还列举了多种证据,以支撑他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这项更为严谨的研究设计极大地增强了其论点的说服力。尽管这项研究是基于少数拉美国家的经验,但它在方法论上是相当成熟的。很多人把它视为对现代化理论的决定性反驳。

我们只是对受依附范式影响的学术研究做了一个很不全面的概述,但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这样的概述中,这一连串理论观点的成果也颇为丰富。然而,截止到1980年代初,研究者的注意力已经被迫转向一系列对其观点不利的事实。对新依附论者而言,对其观点最为不利的事实来自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简称NICs),尽管这些国家处于世界上最具依附性的国家之列,但是它们却经历了大约二十年的高速且相对稳定的增长,并且这种增长也没有受到恶性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危机的损害,而这些问题一直折磨着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此外,这些国家提高了农业产量,并

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了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

与此同时,“官僚—威权主义”论点还面临着一个挑战:官僚威权主义本身正在消亡。资本紧缺曾被认为是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出现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八十年代早期,尽管资本紧缺的情况愈加恶化,原来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却开始迅速民主化。

理论与范式脆弱性的原因

这些富有吸引力的理论和范式在如此之快的更迭中被抛弃,我认为其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很多研究发展中地区的比较政治学家没能在理论形成的过程中利用全部的可得信息,再就是,理论的受众也乐意接受没有强有力证据支持的理论。让我再重申一遍,问题不在于,研究者获得新的信息之后,新的理论与范式就会取代旧的理论与范式。那是知识积累取得进展的正常方式。问题也不在于,在过去的几十年之中,研究者没能利用那些直到最近才得到广泛应用的分析工具。恰恰相反,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能在传播理论之前多做一点简单的事实核查工作,理论观点的受众能在接受这些观点之前多持一点怀疑态度的话,我们本来有可能更为审慎地决定需要摒弃哪些理论,并因此取得更快的知识进步。或许,我们本来只需几年的时间来仔细检查这些观点,用不着花几十年的功夫来做这件事。现代化理论中那些如今看起来强有力的部分没准能挺过依附理论的鼎盛期——依附理论中的某些部分说不定还可以重新引起我们的关注。

分析家们没有忽视证据,但他们是在有选择地利用证据来发展、

支持或者检验理论。例如,现代化范式中的许多论点,就仅仅使用了来自一些北大西洋国家的证据。早期的依附理论试图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停滞现象,但它们却轻易忽略了可得快速增长证据。后期得到拓展的依附理论承认增长正在发生,但是它们却忽略了来自东亚的增长证据,与拉美和非洲不同,大部分与发展有关的危机和混乱在东亚的增长中都不存在。很多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既不去收集国家在不同情况下的实际表现的系统性证据,也不去利用已经由别人收集好的这类证据。

研究者们普遍忽视证据,这使得我们难以更好地理解经济发展,而这种理解本可以有效地影响政策选择。由于忽视了证据,我们没能注意到,那些通常是作为政府推动工业化战略的一部分而被执行的政策,实际上引发了很多后发展经济体(late developing economies)所特有的经济问题。被高估的汇率是被用来将资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它导致了经常性收支平衡危机,并且降低了出口商品的产量。高关税推动了不具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的发展。偏向城市的政策旨在促进工业化,但这却使收入分配的情况恶化。到1960年代末,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已经弄清了进口替代发展战略(import-substitu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与那些令人始料不及的后果之间的联系,政治科学家们也能很容易地在出版物上找到这些人的论点(例如,Hirschman 1968;Fishlow 1971;Leff 1968, 77-88;Kuczynski 1977),尽管这些论点也没有得到检验。然而依附理论的传统中的论点却继续把这些问题归因于后发展国家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关系的结构性特征,现代化理论的传统中的论点则继续把发展的困境归因于文化。因为在这两种传统之中,政府都被假定是反映社会利益的,所以政府行为及其后果很少成为研究的焦点。

根据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 1957, 16)的观察,人们可以把

一个范式“从一架社会学的望远镜变成社会学的闪光警戒信号”(参看 Kuhn 1970)。观察者们可能会指出某种特点或现象的存在并对其进行描述,他们或许会以即兴的方式对其进行详尽讨论,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把它或它的推论纳入到理论中去,因为在主流范式的背景下,这种特点或现象被认为是附带现象(epiphenomenal)或是不重要的。

现代化理论家与依附理论家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没能系统性地探讨政府政策对经济表现的影响,即使每个人都认识到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政府都对其经济进行了强力干预。学者们详尽地描述了政府推动发展的努力。在对发展中国家所做的大量案例研究中,对政策及其效果的描述显得十分突出。观察者们也认识到,国家领导人的利益与意识形态影响了这些政策的内容,并进而影响了增长成果在不同集团之间的分配。然而,这两种范式——它们分别借鉴了多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都假定这些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反映了社会的利益。因而,很多观察都沦为非理论化的描述。

例如,这两个学派的分析家们都认为,当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十分庞大的规模,但还未能威胁到有产者最根本的经济利益时,民粹主义政策(populist policies)反映的是社会利益在这一发展阶段的分配状况(例如,di Tella 1965; Weffort 1965; Ianni 1968; Cardoso and Faletto 1979)。有几项研究描述了政党与领导者个人在塑造并动员民众部门(popular sector)的利益表达上所扮演的角色(例如, Powell 1971; Skidmore 1967; Collier and Collier 1979)。但是,这些描述并没有在支配性的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相反,这些理论继续强调结构性原因——尤其是与工业化相关的民众部门的增长——或多或少会自动促使政府做出采纳特定发展战略的决定。

有些政策的目的明显就是迎合那些使民粹主义联盟得以维系的利益,但这些政策所导致的经济结果有时却没能带来所有预期的收

益,研究者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是因为文化特质不推崇经济努力,要么就是因为外国人与本国那些规模小但实力强的利益集团所筹划的阴谋,他们能够通过非正式或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其目的。经济困难有可能是由政策无心所犯下的过错引起的,但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考虑。政治领域有其自身的系统理性,它是部分独立于社会经济利益的,这种可能性也没有得到认真的考虑。结果,尽管在很多受依附论影响的论点中,“国家”(the state)要么扮演“统治协议”(pact of domination)的执行者的角色(Cardoso 1973a),要么扮演威权主义统治时期支配性利益集团的联盟伙伴的角色(Evans 1979; O'Donnell 1979),但是,几乎没有哪个政治科学家曾做出过任何努力去评估国家政策对经济结果的独立作用。相反,大部分分析家似乎已经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政府的论调,即在发展中采取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符合国家利益。

当然,理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简化这个世界,并且在把研究者的注意力转移到某些现象上的同时忽略其他现象。没有这样的简化,理解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提供对世界的简化这一点上,现代化范式和依附范式中所包含的理论与其他理论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当理论得到了检验并被发现有缺陷的时候,分析家们就会感到迫切需要寻找对其他结果的其他解释,尽管该理论似乎已经解释了这些结果。在这一寻找替代性解释的过程中,他们会尝试已受注意的对其他现象的解释潜力。如果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能够更为充分地遵从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的惯例,即提出假设,用证据检验假设,修改或替换最初的假设,再次检验,再次修改或替换等,那么他们本可以在更早的时候就严肃地对待政府政策与经济结果之间的关系。所以,真正的问题就是,如果分析家们遵守那些标准的研究设计惯例,那么范式只能临时性地充当闪光警戒信号的角色。

本书中我所关注的是研究规范,但是,意识形态、偏见及美学当然也会使我们忽视可得的信息。很多愤怒的观察者已经指出,当学者们确定在他们看来哪些理论在本质上可信时,他们的意识形态取向起到了作用。在很多北美的社会科学家看来,现代化理论有着相当大的直觉上的吸引力,但是,对于很多第三世界的学者而言,这一理论似乎带有种族中心主义色彩,态度上显得故意屈尊俯就而且不真诚,他们认为,这一理论是在为剥削性的国际分工做合理化辩护。依附理论把欠发达归咎于剥削性的外部力量,与现代化理论相比,这一理论对很多第三世界的学者有着更大的吸引力。正如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 1969)指出,马克思关于社会在少数有产者和深陷贫困化的大众之间形成两极分化的有力剖析更能在第三世界的观察者们当中而非在先进工业社会的公民当中引起共鸣。因为第三世界的观察者们生活在与这一观点的描述相似的社会中,而先进工业社会的公民则更为熟悉更加复杂的阶级结构。

简言之,不同理论在直觉上、情感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一定会增强它们在不同群体中的说服力。当理论与个人的经验、偏见和意识形态相一致时,理论看起来是高度可信的。学者们没有什么动力去不辞劳苦地发掘事实,以确认与自己观点一致的理论,因此,他们没能挖掘出那些会否定理论的事实。然而,在政治科学界,更强的研究规范可以减少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迪克·斯克拉(Dick Sklar)已经指出,尽管理论是在意识形态的罪恶而非科学的美德中被构想出来的^①,但是,规范对检验与重复(replication)的要求会使我们迅速放弃与证据不符的理论观点。

如果研究共同体不仅奖励理论创造,而且还具有要用最佳可得信

^① 个人交流。如果想看到对其观点的概述,参见 Sklar(2002)。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98027111077006133>